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一十三期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编者的话：现代政治与前现代政治的区别是，一是公天下，一是家天下。上世纪的中国，斜枝旁逸，出现了党天下之新花样。

如果说公天下是权力的“全民所有制”，家天下是“个体所有制”，那么党天下就算是一部分人的“集体所有制”或“股份合作制”。

从某些方面而言，文革即起于家党之争。换言之，文革就是要以毛江夫妻店取代十七年的“刘邓黑店”。如果说此前的“路线斗争”还是在体制范围内进行，此时的斗争已经出了圈。无法无天之毛操弄国器民意，以夫妻二人凌驾于党国体制。

本文记述的这段时间，毛资源耗尽，且年老力衰，智穷虑竭，信得过的只有夫人及其身边亲信，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能祸国不能治国。党国体制打而不倒，即散即聚，且逐渐聚拢被文革派毁灭的人心。

文革是毛的家天下，但家天下毕竟与党国道统体制不符。从道统而言，家天下违背党天下，前者是独占，后者是共享；从体制而言，夫人干政历来为组织原则所不许。更何况作为毛的第三任妻子，一个出身上海滩的女明星，比起前两任不具正统性。再者，其人骄横跋扈又浅薄无知，使人戒惧又令人不齿，其威势完全得自毛。江的二重性一方面使她成为毛整人的利器，另一方面也成为毛的软肋。

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既然知道顶江就是顶毛，为什么邓还要不惜涉险批毛的逆鳞？盖因事关身家性命。江代表了毛造反的一面，一旦当权，众人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文革已经证实了的。反之，江一伙也深知，“走资派”一旦当权，他们也没有好下场，这是后来的发展同样证实的。

当时的格局可以看作毛自身矛盾的外化。一边是当权的党国体制，一边是造反的家人亲信，前者是有能而不忠，后者是有忠而无能。正如本文所说，前者是为了“恢复十七年的党天下”，而后者则为了保卫文革家天下的“胜利成果”，南辕北辙。于是从批江到批邓，摁倒葫芦起来瓢。索性换上个籍籍无名的华国锋。却不料，越是“放心”，越是走眼，毛尸骨未寒，遗孀即被“一举粉碎”。盖因权力斗争，你死我活，“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随之结束的，是人人切齿的文革。

说到底，党天下就是改头换面的家天下，只不过是“集体家天下”。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无论国民党从蒋宋孔陈转到父死子继，还是中国大陆从“十七年”走向文革，都是例证。

现代社会，权力一日不归公，天下一日不安宁，庙堂江湖，皆为所困。

嬗变：从批江青到批邓（下）

郑仲兵

从批江到批邓的嬗变

（下列史实，主要录自《邓小平年谱》，按语为作者的说明和点评。——郑仲兵）

1975年3~4月，江青、张春桥又搅起批“经验主义”风潮，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看似批周，实则打邓。

3月1日，新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大讲反经验主义。4月1日在他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中提出：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4月4日、5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要求政治局讨论。

邓主动向江开战

1975年4~5月，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祭起“三项指示为纲”的大纛，展开全面整顿工作，由被动挨江青的攻击，转为主动向江青开战。

4月18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之后，向毛泽东反映自三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所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按：前引号的话，不可理解成是批江青或“四人帮”。显然，毛并没有放过“经验主义”，说它也是“修正主义”，没有说批经验主义不对。后引号中的话，似有点江青的意思，但没有理由说它就是批江青的，毛的玄机待考。自三月份以来“批经验主义”，是否是江青、张春桥的自作主张？还是毛的部署，或者闻毛之风而动？）“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按：邓小平上当了，1956年邓小平为毛“引蛇出洞”阳谋的总指挥，此时竟也身不由己地被毛“引蛇出洞”了去。）

4月27日，邓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贯彻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精神。会上，和叶剑英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四人帮”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按：毛4.23批示只说“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怎么成了邓、叶“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反经验主义的错误”？邓错估了形势，以为到了清君侧的时候了。）江青被迫作了检讨。（谁知道她是出于何用意？）会后，王洪文以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为名致信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按：王洪文岂有如此“斗胆”？可见其受人指使。）

4月29日，邓前往三〇五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

主义。（按：“要马列不要修正”，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可以肯定不是说江青的，更像是说周，并警告邓。第二条，“要团结不要分裂”，可以理解成兼指双方。第三条，“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似在说江青，但更像对王洪文汇报内容的回应——“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何况，从来没听说过毛批江搞阴谋诡计！）毛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按：这是毛对邓到他那里告江青的回答和结论。人们看这段话，往往忽略了前两句：“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这是毛所强调的，已带有指责邓的意味。接着说“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潜台词是“讲明白即可”。之后连续讲“上半年解决不了，……”显然不是讲要“解决”江青或江青问题，而是接上句的“问题要讲明白”。而且说到“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说明在毛看来，并不是要急于解决的问题，或者根本不算是什么问题。这段话，后来被华国锋、被邓小平、被官史所歪曲是显而易见的。）

5月4日，邓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核对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内容，研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和如何传达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问题。5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两次会议均未见讨论过程的披露。

5月19日，邓出席中共中央军委第十三次常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汇报。（按：这是邓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天，头一天上午回京，下午到医院看了周恩来。）邓小平说：我们不但要提社会主义，还要提爱国主义，你没有社会主义觉悟，至少要有点爱国主义。有些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了，还搞什么社会主义？（按：这是批评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人，是对江青批经验主义的回应。）你们回去传达时，就说这个话是我讲的。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按：明显带着情绪，不只是冲着江青他们说的，因为能够打倒他的只有毛。）

5月21日，邓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在会上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按：邓小平抬出总路线来压批唯生产力论者，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5月27日，邓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落实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精神，对江青等进行批评。指出：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在谈到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的批评时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按：此话是拿大帽子压江青他们。因为毛说“不要小题大做”，邓没有接受毛的警告，现在正在“小题大做”了。）因而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的问题。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这没有什么过。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一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按：俨然一副整肃批斗的口气！）会上，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也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按：吴、陈也转向了。）

5月29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按：毛何时提出“三项指示”？）邓说，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今年三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

5月下旬，邓小平阅周恩来致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周在信中写道：“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在总政三月一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这段话旁批注道：“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按：周故意略去江，邓还要把她点出，毛阅后会作何感想？周用“请教”一词，极具戏剧性！）

6月3日，叶剑英就邓小平五月二十七日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继续批评、质问江青等。在政治局成员集中批评“四人帮”的形势下，王洪文、江青在会上被迫作了一些检讨。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政治局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按：邓借毛4.23批示和5.3讲话之势连续发动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斗争。他的发言，让人看到“破釜沉舟”的气概。邓不可能想不到，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触犯毛。联系毛反击后邓的伏低做小之态，实在无法理解。）

6月初，江青到邓小平家中谈话。邓后来说：江青找我，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按：说明江没有认错，还坚持她的一套。毛有示意好，邓却不依不饶。）

6月7日，邓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批评江青等人的情况，并反映他们到最后仍否认有“四人帮”。毛泽东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按：早在5月3日，毛就说过：“有问题要讲明白”。现在说“把问题摆开了”，应该有见好就收的暗示。）还提出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希望邓小平把工作干起来。（按：“风向快要转了”，指什么？要邓小平把工作干起来，指什么工作？都看不明白。）邓小平向毛泽东表示：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按：话何以说得这么没底气？可见邓已听出毛的话音了。）此前，江青曾向毛泽东反映中央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

同日晚，邓小平和王海容、唐闻生前往三〇五医院同周恩来长谈。周、邓要王海容、唐闻生将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四人帮”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按：周写信，邓见毛不是将批评会的情况都向毛报告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托她们向毛报告呢？似可说明周、邓的报告，没有从毛那里讨到明确的回应。）

6月28日，江青就毛泽东一九七四年以来多次批评写出检讨。

6月30日，周恩来将江青写的检讨批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一检讨，（按：周是最识时务者。）并建议将检讨送毛泽东批阅。

6月底或7月初，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传阅周恩来批转的江青的检讨。邓小平阅后批注“同意总理的建议”。毛泽东圈阅了此件。（按：没有批语。）

7月1日，叶剑英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持人选（主持人是王洪文，王前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际，向毛提议，在他离京期间，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致信毛泽东：“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按：叶主动回避。）毛泽东批示：“同意。”

7月初，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毛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艺工作，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按：何时有过百花齐放？）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在邓小平指出现在文艺不活跃时，毛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月9日，邓同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谈话，传达毛泽东对“四人帮”控制的文艺工作的批评意见。指出：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按：毛批评意见中未提百家争鸣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毛主席最近对百花齐放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又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同时，要求政研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论时用。次日，胡乔木召集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开会，商议调查研究的题目、方式和分工等问题。这以后，国务院政研室通过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

出版系统违背“双百”方针的一些材料，向中共中央、毛泽东转呈了一些信件。（按：毛和邓只谈了文艺问题，并没有让他去收集江的问题，邓不仅把它扩大到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而且还布置收集、上报。）

7月18日，张天民分别致信毛泽东、邓小平，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片《创业》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重新上映该片。张天民致邓小平的信，由胡乔木转给邓小平。随即，邓小平将信转交毛泽东。

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给邓小平的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7月26日，胡乔木将电影《海霞》主创人员谢铁骊、钱江给毛泽东的信（按：文化部把《海霞》说成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交给邓小平。邓小平很快就转送给毛泽东。29日，毛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30日，根据毛的批示，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文化部负责人和《海霞》摄制组成员参加的审片会。接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在全国上映修改后的《海霞》。

7月，邓小平同毛泽东谈话。汇报说：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夏粮丰收了，秋粮长势不错。还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在汇报到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时，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表示有人讲一讲，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按：邓显然去讨毛的话，但毛没有为他说好话。邓只好自我解嘲，说“有好处，没坏处”。结果毛来了句“无非是挨骂，我历来挨骂”，显然带有情绪。）

8月2日，邓小平阅汪东兴报送的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电话请示记录，作出批示：“电话复：可在长影本单位传达，其他单位不传达。”七月二十九日，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转报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关于学习和传达贯彻毛主席“七二五”重要批示的请示报告》。（按：邓发动对江的“火烧”够急的！江得知会作何反应，毛看到会作何感想？）

8月8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教师李春光贴出大字报，揭露并驳斥（文化部及其上司）对影片《创业》的无端责难。大字报的抄件经邓力群、胡乔木送邓小平，邓转送毛泽东。毛阅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按：毛未云何以为用，更没有对大字报的内容加以肯定。）

8月12日，邓小平阅江青本月十日来信，得知江青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在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连队搞了三个试点，还把这三个连队的指导员分别派往湖南株洲和天津农村，准备搞一年的试点；待任务完成后，江青准备和姚文元、陈锡联、纪登奎一起接见他们。随即，在信上作出批示：“三个指导员蹲点时间已久，目前正在整军，他们以早回部队为好。建议仍由江青、文元同志处理，回部队后，由北京军区谈话，锡联、登奎同志忙，可以不参加了。”（按：邓小平开始直接拆江青的台，且把陈锡联、纪登奎和她拉开。可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了。）13日，江青在邓小平批件上批意见：“如果部队没有特别困难，建议他们三位还是按主席的指示，在基层坚持一年为好。”（按：江青与邓小平叫板，还用“主席指示”来压邓。）14日，邓小平接到江青要秘书打来的电话：完全同意小平同志批示，取消留基层一年的建议。（按：只过了一天，江的态度完全“变”了，表示“完全同意”邓的批示。何以如此，意味深长。）

8月13日，刘冰等联名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揭发迟群（按：还有谢静宜。）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邓小平收信后即转交毛泽东。（按：邓小平不知向毛转送了多少封“告状信”和材料，有的信和材料是有意组织人写的。矛头直指江青和文化大革命，颇有逼宫之势。邓小平的主动进攻之势，似到此为止，下面应是毛和江青们的反击了。）

毛评《水浒》，邓陷入进退两难

8月14日，毛泽东同陪读人员谈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书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按：宋江搞什么“修正主义”？显然在借古说今！）当天，姚文元得知消息后致信毛泽东，提出将毛泽东的评论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和有关宣传、出版部门，以“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按：姚文元反应如此之快，毛立刻批示“同意”，更可见评《水浒》的“项庄舞剑”之意了。）之后，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谈话。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按：江青点了题。所谓“现实主义”，所谓“架空毛主席”，显然是毛的意思。）

8月21日，邓小平在驻地会见胡乔木，接受他转交的萧劲光本月二十日致邓小平的信。邓后将信送交毛。信中揭发七月十四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刁小三的逻辑》、上海《学习与批判》第七期发表《八路军的“样子”》的文章攻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当日下午，邓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目的会议。在胡乔木问前不久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是针对什么、是不是特别有所指时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后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按：胡乔木很敏感，尤其对毛的言行。邓是在装糊涂。）

8月2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修改《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按：“提纲”是7月中旬胡耀邦到中科院工作后，主持起草的。）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你同耀邦他们一起议论一下，要亲自动手修改。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你转告耀邦、李昌，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按：邓小平这个“钢铁公司”现在也言“慎重”了。还要胡耀邦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可见他是有警觉的，心态在改变。）

9月1日，邓小平阅杭州大学教授夏承焘来信，作出批示：“夏我不认识，反映的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印送政治局同志参阅。”夏承焘在信中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相当数量的旧知识分子，由于历史或思想原因而受到冲击，建议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到基层。（按：此信邓就没有转给毛了。）

9月5日，邓小平将一封关于要求进一步落实文艺工作政策的来信批送中央政治局成员参阅。这封署名“天津市文艺界一个普通党员”的来信说：近几年来文艺界出现的一些事情很难使人理解，……特别是落实政策问题，文化部过去十几个副部长，一个都不用，司局长也放在一边，还有大批老演员也闲着；有人一说就是“十七年”如何如何，好像文艺界十七年就没有好人了。（按：此信也没有转给毛。）

9月13日，邓小平会见送来江青在大寨讲话材料的胡乔木、吴冷西。在他们谈到江青讲话中称“宋江架空晁盖”是影射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时（按：没有毛的意思，江岂能乱说？），邓说：真的指我，那要把讲话材料送主席看。不过不能由我送，要通过别的途径。

（按：显然已乱了方寸。）又说：不要紧，让她说。现在叫喊反复辟的人，自己就是搞反复辟的。（按：一句自我镇定、自我安慰的话，但说得理不直气不壮。）还指出：现在教育方面的问题积了一大堆。国务院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按：教育方面当然问题严重，但教育是毛亲自而不是通过江抓的，迟群、谢静宜都是毛亲自派的。后来事实也证明，毛就是从教育问题上开始批邓的。邓小平在这里说的话，无非是要给身边的秀才们壮壮胆，秀才中的大多数，比邓小平还胆小。）

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二十五年的目标来说，（按：指用25年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按：邓何以把这次会与七千人大会相比？似用隐喻的方式，强调这次会要用党内“让人说话”、“出气”的做法，来调整 and 改变文革发动九年的伤病局面。而七千人大会正是他负责筹备和组织的。）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的讲话多次被江青的插话打断。

9月16日，邓小平审改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随后将文件报毛泽东审阅，并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此事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过一次”。“这个问题较大，我想当面得到主席的指示”。“我还有几个重大的人事变动问题，也急需向主席当面请示”。（按：邓巴望见毛的心情可见。）

9月17日，邓审改外交部、中联部《关于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拟同意，略有改动。”随即报毛泽东等审阅。《接待计划的请示》中提出，拟请江青等出席欢迎宴会和专场文艺晚会。（按：是例行公事还是向江示好，或试探毛的反应？）之后，毛泽东对两件请示批示：“已办，退小平。”“另，江青不要参加对越活动。”

9月19日，邓小平会见前来请示工作的胡乔木。在听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准备写一篇关于全面宣传毛泽东三项指示的文章时，指出：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如果写得好，我可以约几个副总理研究一下，再送主席审阅。主席同意了，就交政治局议，政治局批准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按：此时，邓还祈望通过“三项指示”的文章实现转机。）

9月20日，邓小平和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施行大手术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按：邓后来回忆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我想这应是实情，只不过周的这句话也许还更加重了毛对邓的疑忌。）

9月24日，邓陪同毛泽东会见黎笋后，汇报江青在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关于评论《水浒》的讲话情况。（按：指江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邓在13日和胡乔木等人谈话，曾认为自己向毛反映江青问题效果不好，想以沉默待之，看来，他还是沉默不住了。）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此前，毛泽东在华国锋请示说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时，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按：毛真是权术高手，让你感觉得到，又说不出，令人到死之前，还愿意放弃幻想。）

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和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认为社会上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按：虽说是毛远新汇报“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但可以看出，是在与毛的观点相呼应。毛家的人开始行动了，开始对邓反击了。毛远新说得不错，其实明眼人也都能看出：“社会上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窃以为不是“一股”，而且多股，除了一小撮文革受益者外，谁人不否定文革呢！）

9月27日，邓小平出席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他仍强调：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按：邓有意把矛头指向江青和文艺界。）恐怕在相当多

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还说，不能听到风就是雨。（按：“不能听到风就是雨”，显然是指毛评《水浒》，特别是江青所云“架空毛主席”等等。邓在整顿中的所言所行，显然锋芒指向了毛泽东的文革基本方针政策，而其手法则是以毛之矛陷毛之盾。毛岂能感受不到，岂不恶之。）

9月30日，邓小平把经过修改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表示不满意，特别提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曾记得讲过。（按：毛究竟讲过这句话没有？如没讲过，为什么《提纲》要这么写？毛看了《提纲》后，仅仅是“不满意”吗？）

9月下旬，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邓小平关于“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精神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

10月3日，邓小平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目的会议，强调要学习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吃饭时，邓同大家交换对前一天晚上看电影《春苗》（按：江青等人肯定的电影）的看法，对影片中批斗“走资派”表示不满。在谈到话剧《万水千山》时说：《万水千山》受到虐待，找不到好的戏院演出。（按：看来，此时邓尚未屈服，《万水千山》或算是邓搞的“样板戏”，但也不脱极左文艺的窠臼。）

10月5日，王洪文致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的信，信中写道：“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十六号文件中的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我认为浙江原来从上到下，特别是省主要领导同志、地县主要领导同志都存在资产阶级派性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

10月7日，邓小平阅王洪文的信，并写了批语：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按：不难看出邓和王二人在针锋相对地斗法。王是明显地在找邓的茬。）

同日，根据邓小平领导整顿期间多次讲话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初稿完成。

毛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0月13日，刘冰等再次联名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揭发迟群、谢静宜“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按：何人？）、“搞非法组织活动”的情况。此信由胡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即转交毛。（按：谢是毛的人，她“攻击”的对象倘是邓，来由不费猜详。邓还要转这封信，还是想为之一搏。）

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对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批评道：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而且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信为什么还要经小平转。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按：戏的正本总算开场了。毛已点题：“当前两条路线斗争”。从江青、张春桥批经验主义、之后毛谈《水浒》，到江青在大寨说邓架空毛，在农业学大寨会上和邓叫板，毛远新向毛汇报对形势的看法，在浙江省委发动群众批派性问题上王洪文和邓公然顶牛，以及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对邓的攻击等等，都是戏前的戏。从现在开始，正式批邓才出台。）

10月23日，根据毛泽东本月十九日的意见，邓主持召集有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参加的六人会议，和李先念、汪东兴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来信的批评。经过初步讨论，会议一致表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并就如何贯彻提出两个方案。（按：邓从此处被动招架之势。）

10月31日晚，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我有些事须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一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按：可以想见邓当时的心情。）

11月1日晚，邓到毛泽东处谈话。毛肯定邓领导整顿的成绩（按：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413-414页记：“邓问毛，他主持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毛说，对。”可见是极有保留甚至勉强的肯定。）同时批评邓小平为刘冰等转信的做法。

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毛远新在谈到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时说：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又说：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按：指周恩来。）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本人谈出以上意见。（按：毛远新的汇报，与其说是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导火索，不如说是对邓战略反击蓄谋中的一着棋。）

当晚，毛泽东即指定陈锡联、汪东兴、毛远新和邓小平参加四人会议。（按：中共正式开始批邓。）毛远新对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工作，特别是实行整顿加以否定。邓小平反驳说：“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按：邓此时还能据理反驳。）

11月3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二日晚四人会议情况汇报时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但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毛决定继续开会，范围扩大至八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参加。毛说，讨论限于“文化革命”问题，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按：可见，毛是十分清醒的，思维很明晰。）

同日，吴德到清华大学参加校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所写信的批评。会后，根据校党委的部署，在校内师生员工当中展开一场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的大辩论。（按：毛已点燃群众斗争之火。）

11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到邓小平家中谈话。谈话不欢而散。

11月4日，邓小平出席八人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会上，张春桥等指责邓小平：刘冰之所以把信寄给你，是由于你与刘冰彼此立场、感情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当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八人会议讨论情况。毛泽东说：我批评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指示八人会议要逐步扩大几个人。（按：据程中原、夏杏珍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在一九七五》记述，当毛远新谈到会上有的同志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毛特别强调他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可是后来打倒“四人帮”，抓了江青，却说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华国锋、邓小平、中共的官方史书都是这么说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11月5日，邓小平就外交部《关于缅甸总统吴奈温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我觉得以后对主要国宾，由我一人出面，过于繁重，故这次拟请春桥出面（当然也可能客人有点见怪，以后春桥或先念多出面，就不致于误解了）。如何，请主席考虑指示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审核。”毛泽东阅后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按：邓似用扬言“撂挑”的方法，来试探毛。）

11月7日，邓小平再次出席八人会议。

11月1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表示：我现在受批判，起因是转送刘冰的信。（按：送信只是个“由头”！）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我作了自我批评（按：什么内容，未见记述。）在胡乔木提出今后是否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政研室领导时摇头说：不要！（按：胡乔木

就是这样的见风使舵，他倒是可以称得上“投降派”。)

11月13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吴奈温后，邓小平和张春桥被毛泽东留下谈话。毛泽东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按：毛让在“整顿”中支持邓的人参加“帮邓”，即批邓，这一招真是够阴损的!)毛泽东还就打招呼问题作出批示：“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按：所谓“桃花源中人”之说，应是毛的解嘲，因为邓是毛请出山的。)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按：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按：毛对批邓是步步扩大，步步紧逼。)

11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会议指出周荣鑫、胡耀邦、李昌三人的“错误”，并通知胡乔木等四人，提出中央政治局将在近日内开会谈他们的“问题”。(按：毛让邓自己主持批邓会——真够挖苦的。)

11月15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按：指11月20日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晚二十三时，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按：还给邓以错觉。)

11月16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评内容。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胡耀邦、周荣鑫进行指责。

11月17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十六日会议汇报后的指示。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对胡乔木、周荣鑫进行指责。

11月20日，邓小平出席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按：毛给邓出难题，恐怕同时也是给他最后一个机会。)

11月21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按：13日毛批示给“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只提出周荣鑫等“几十人”，邓何以扩大这么多人?)，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次日，毛泽东批示：“很好。但不仅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23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同日下午五时，邓致信汪东兴：“请照主席今二十三日批示，通知于明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开会。原件政治局各同志传阅。”(按：可见邓此时工作的重点也转移到开打招呼会和召集人批邓。邓小平对“批邓”如此精心安排，但毛还要层层加码!毛考虑得还如此精细。)

11月24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并宣读经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按：《要点》是邓小平主持下搞的，“右倾翻案风”由此见于中央文件，邓大人真敢为自己上纲上线!)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邓小平就“三个正确对待”(按：指正

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正确对待“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待青年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说明。还说：这次清华大学的辩论，将很快会扩大到全国。这次会议，有中央党、政、军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和几位青年负责同志（按：还是找了青年人。）共一百三十多人出席。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要求他们进行讨论并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这个文件传达范围逐步扩大到基层。（按：这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12月20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检讨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并介绍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状态。（按：这是邓的第一次系统的检讨，看出他对毛还存在幻想，还在说违心话。）他检讨说：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会后，邓致信毛泽东：“在今（廿）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同志们还会继续给我以更多的批评和帮助，使自己得到更大的益处和提高。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按：毛至死也没有见他。）

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公布毛泽东批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1月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作补充检讨。在检讨中说：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请示主席，也没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会后，邓将补充检讨稿送毛泽东，并致信表示：“上次在政治局会上作过初步检查之后，又听到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六位同志，随后又是两次大的会议上，同志们又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评和帮助，使我进一步地认识到上次检查的不足。”“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取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外，总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取得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按：邓求见毛的急切心情如此，他愈急于求见，毛愈不见他。）十四日，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按：所谓“发政治局讨论”，就是要继续“深入”批他。）

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1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时，遭到叶反对。叶提议由邓小平给周恩来致悼词，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

1月17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见面，阅胡乔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商量后起草的给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的一封信。信中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业务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邓小平阅后表示同意信的内容，并说政研室的问题要听候中央处理。十九日，这封信发出。（按：胡乔木就是这么个人，当时已吓得失魂落魄，开始揭发邓小平。）

1月20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检讨（按：应是第三次检讨）。会上，江青等轮番对邓小平进行指责和批判。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提出要见主席”的责问，邓答道：我的意思是，想当面向主席讲自己错误的严重，特别想当面听取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还想当面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种要求是正常的，我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按：此时连请求见毛都被当成问题。邓已然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是夜，邓致信毛泽东：“在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由我讲讲要对主席当面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二十）晚的会议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供审阅。”“我两

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错误和面聆主席的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提出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确很踌躇。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栈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主席面谈这个问题为好。”“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我自己再不提出，实在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按：邓最后一次见毛是75年11月13日，距此已两个月零八天了。邓巴望着见毛，毛就是不见他，而且还让人提出：“为什么要提出见毛主席？”这就是专制体制下君臣关系。此时邓只好提出解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职责为要挟，可能也是最后的试探吧。）

1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二十日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后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按：何谓“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按：何谓“引导得好”？）在毛远新请示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个人做具体工作时，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按：毛看重的是华是“自认为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有意思！要华带头，就等于宣布邓下台了。）在江青、张春桥授意下，迟群召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会议，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按：两校是毛亲自抓的，为什么非说是江、张授意的？公然点名批判，意味着毛已把邓当作非“内部问题”加以整肃了。难道这就是毛说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吗？真是虚伪狡诈之至！）

1月~4月，在江青、张春桥指使下（按：又说是江青、张春桥！），迟群主持编出了《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言论与马列毛主席教导对照》、《邓小平言论与孔孟之道对照》、《邓小平与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言论对照》等材料。（按：这是毛整人，置人于死地的一贯手法，也算是一大发明创造！）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按：指【1976年】1号文件），宣布：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自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后，邓小平实际上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按：恐怕是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只有聆听大批判的份了。）叶剑英实际上被停止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2月25日~3月初，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打招呼会议），传达经毛泽东批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提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按：已经上纲到“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按：何谓“擅自召集”？）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十二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当众指责邓小平是“反革命两面派”、“法西斯”，“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江青要求把她讲话的部分内容印发全国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批邓”问题在党内公开。（按：实际上早已公开。）

3月26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青等的策划下，迟群等带领清华大学五名师生代表列席会议，以“汇报清华大学运动”为名，当面攻击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复辟资本主义”。（按：何以见得不是毛策划的？什么“出席政治局扩大会”，明明是出席批斗会！）、

3月下旬，南京等地爆发声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4月4日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二百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

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邓小平要求全家人在这期间都不去天安门广场。

4月5日，邓小平出席政治局会议。张春桥当面指责邓小平是纳吉。

4月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按：未通知邓小平、叶剑英等出席），一致通过：一、《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还提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本日下午，邓小平夫妇被迁至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住下，并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4月8日夜，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转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在信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按：竟能说得出出口，真是可怜之至！）

结语

从1975年4月毛授权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到1976年4月毛再度拿下邓小平，历时正好一年，而邓小平主动和江青叫板，并开展整顿不过半年。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为江、张等批经验主义向毛泽东告状；赚得毛4月23日的批示和5月3日讲话对江青批评后，邓即主持政治局会议多次批江。与此同时，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开展全面整顿，顺带揭江，包括拆江的台，不断向毛转递各方面告江的信，甚至有意布置收集有关江的材料，……整顿从经济领域出发，直逼江青的领地——文化艺术界，直逼毛掌控的教育领域及其试验地——两校。于是到8月14日便有了毛评《水浒》的出台，所谓“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义”，显然是冲着邓说的。

毛评《水浒》成了一道分水岭。从此，毛不再待见邓小平而开始收拾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更借势对邓展开反击，邓顶了一段时间，但已处处被动。

人们难免要问：邓复出前曾向毛发誓“永不翻案”，又明明知道毛江的政治关系，何以1975年春就胆敢向江青主动出击？是他真的相信毛对江青的批评？真的相信毛对他的倚重？还是他看到林彪命丧黄泉，毛有难言之隐，周恩来病入膏肓，无回天之力，江青、张春桥积怨甚多，难以成器，毛自己老病缠身，不知所终，寻思收拾残局，舍我其谁？此题自有待深入考据，但可以肯定地说，邓小平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完全低估了毛垂死挣扎的力量。

1975年10月13日，邓小平又转递了刘冰等人再次告迟群、谢静宜致毛泽东的信。毛说：“矛头是对着我的。”算是图穷匕现，于是以“帮邓”名义开始正式批邓。从最初的四个人，扩大到八个人，再扩大到十七个人，几十个人，直到一百三十多人，历时两个月。层层加码、步步为营。邓小平几乎没有什么抗争，虽经一再上纲上线地检讨，也无法挽救他一败涂地的厄运。

邓小平主动向江青开战，特别是开展全面整顿，无疑对文革的倒行逆施有一定拨乱反正的意义，从而赢得了社会民众的广泛赞许，加上邓小平在文革中首尾两度悲剧的下场，更赢得民众的普遍同情。但需要指出的是：

一，邓小平在与江青斗争中，在全面整顿中，主要还是打着毛的旗号，借重于毛赋予他的权力，利用他的行政资源，包括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以求恢复“十七年”一党专政的传统。

二，他对文革中民众的自我觉醒，自发地抵制文革、反对毛江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并无积极兴趣，更无在全面整顿中试图改革政治体制，实现人民民主的意识。

三，当四五运动爆发，亿万人民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毛江“秦皇暴政”，同时也为邓小平抱平时，邓不仅没有和人民站在一起，而且还坚决与之划清界限，生怕与自己沾边。甚至还专门给毛写信，表示拥护中央就天安门事件所做的两个“决议”，并为“允许

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感谢”。

四，对比邓小平的批江、整顿和人民群众的四五运动，可以看出，二者在否定文革和政治诉求上的迥异，即便在追求现代化问题上，也非同道。正因如此，不难理解邓小平虽遭毛的两次整肃，但他的后半生还是继承了毛的政治衣钵，成为镇压人民、压制民主的第二代专制独裁者，绝非偶然。

1975～1976年，是文革的最后一年，离今已36年。回望当年，我们看到那是风云际会，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年。

这一年，是毛泽东为文革垂死挣扎的一年，也是他生命走到尽头的一年。

这一年，是周恩来顺从毛的意旨，向邓小平全面交权的一年，也是周在肉体和精神极度痛苦中走到生命终点的一年。

这一年，是邓小平和江青你死我活争斗的一年，也是江倚仗毛最终击败邓并登上政治顶峰的一年。历史充分证明了毛存江在，毛死江亡的毛、江政治夫妻一体化的关系。

这一年，是中国民众普遍觉醒的一年，是人民群众运用毛为发动文革赋予的“四大自由”直指毛及其“四人帮”专制独裁体制的一年。